

滋味

ZIWEI

与 50 位文化名人聊天

张继合 ● 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滋味

与 50 位文化名人聊天

张继合 ●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滋味:与 50 位文化名人聊天/张继合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3.4

ISBN 7-80171-276-5

I. 滋…

II. 张…

III. 文艺工作者—访问记—中国

IV. K825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10153 号

滋味:与 50 位文化名人聊天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)

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字数 236 千字 插页 2

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册

ISBN 7-80171-276-5/K·4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:100007

目 录



I. 老愈弥坚

- 公木：我永远的恩师 3
- 年根里的臧克家 22
- 桑乾河，明媚的阳光
——丁玲、陈明夫妇最快乐的日子 28
- 钟敬文：一个世纪的沉思 34
- 王朝闻的幽默 40
- “看风景”的卞之琳 46
- 已成走影，卞之琳 50
- “看问题”的施蛰存 54
- 贾植芳：步步是传奇 60
- 吴祖光：在新凤霞走后 65
- 文怀沙：笑谈“风骚” 71
- 《白毛女》中的“三老” 77



II. 音乐翘楚

- 命好的“乔老爷” 87
- 王立平：多情的音乐人生 93
- 张藜：少年功夫老始成 99
- 韩静霆想有“三辈子” 105



III. 艺苑精英

- 袁世海的“戏中戏” 113
- 欧阳中石：一往情深说京戏 118
- 凡有井水处，皆听单田芳 124
- 李默然：老而弥坚 132
- 李世济：无愧程砚秋 137
- 王玉磬：河北梆子的“革新派” 143
- 裴艳玲：清纯坦荡闯江湖 149
- 梨园双璧：李维康 耿其昌 156



IV. 书画名流

- 快乐的启功 165
- 天下谁人不识“丁” 171
- 含蓄、幽默的方成 180
- 韩羽：玩出来的大师 187
- 黄绮：几笔挥来魑魅惊 194
- 秦淮河上的莱阳人——忆明珠 201



V. 文坛百家

- ✿ “文化剑侠”何满子 209
- ✿ 李国文“妙语录” 214
- ✿ 牧惠和枪 219
- ✿ 从不屈服的邵燕祥 224
- ✿ 林斤澜：关注小说 229
- ✿ 蒋子龙：一颗社会的良心 235
- ✿ 从维熙：含泪说孙犁 240
- ✿ 钟鼓楼·刘心武 245
- ✿ 余秋雨访谈录 250
- ✿ 铁凝：苦恼中的快乐 256
- ✿ 面对“上帝”的周国平 263
- ✿ 冯骥才：阔大的文心 269
- ✿ 冯骥才：从“卫慧”们说起 275
- ✿ 林非：一蓑烟雨任平生 281
- ✿ 邓友梅“杂说” 288
- ✿ 陆文夫：远离电视 294
- ✿ 叶辛“触电” 300
- ✿ 舒乙：导游中国现代文学馆 306

VI. 我尽量（代跋） 312





公木——我永远的恩师

人比山高，脚比路长。

——公木

以诗为生命，是二流诗人，

以生命为诗，是一流诗人。

——公木

在我所结识的文化名人里，公木先生对我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是他给了我学习深造的机会，是他让我见识了战士的执着、诗人的才情以及教育家的人格魅力。

（一）初谒师门

1990年夏天，我在河北辛集中学复读时，认识了教授作文的陶昆仲和辛集市文化馆的张诚两位先生，后来他们又把我引见给了远在长春的公木先生。由此，我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。

1992年5月，我到长春市的吉林大学参加文学特招考试，



也就是那时，我第一次拜见了公木先生。当时，我只拎着一点家乡的红枣、香椿和小米之类的土产，在陌生的东中华路上徘徊。据说，这个路段居住着很多著名的教授，俗称“柳条路十八家”。公木先生的寓所就在其中一座黄色老楼的二层。走近，见门口贴着一张字条：“下午三时会客”。而此刻正是正午时分，我实在是不知进退。

正在犹豫，门开了，一位戴着深蓝色圆帽子的老先生出现在我面前，看样子他是要出门散步。当时，我一眼就认出：这就是公木先生。

老人对我的到来没有准备，当我通报名姓后，他急忙往里让，并高声吩咐夫人吴翔准备饭食。饭后，吴翔老师见我来得仓促，便又主动把我留在家里住，她说：“到外面住宾馆，得不少钱呢。”

4 考试很顺利。这期间，我有很多机会和公木老师聊天。他坐在客厅写字台旁的单人沙发里——这是他固定的座位。谈的很杂：诗歌，小说，文艺理论…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：一是他对文化的宽容；二是他执着的理想与信仰。



公木先生与夫人吴翔在长春（1994年）

宽容，使我想到鲁迅先生的话：某些批评家还没有看到稿子写的是什么，就恨恨地研磨，大骂幼稚啊幼稚。这种不负责任的“学阀”作风对文化和学术贻害无



穷。

师母吴翔曾对我说过：“青年诗人汪国真一度非常流行，公木先生对此十分好奇。按理说年龄与汪国真相差悬殊的老诗人，犯不着对年轻人那样仔细的研究，但是，他不愿意做人云亦云的表态，而是想亲自读一读汪国真的诗集，看一看究竟好在哪里。可惜，串了长春的多家书店也没碰到，最后在昆明才买到了一本。那本诗集他认真地翻阅了好些日子。”

公木先生始终认为：“文化应该是多元的。喊了多年的‘百花齐放’，怎么就不允许有主流之外的文化生态呢？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‘朦胧诗’，诗歌界很多人以为是背叛传统的，应该批判。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，口诛笔伐是不起作用的。当我陆续从学生手里拿到一批朦胧诗作的时候，读到的是许多令人欣赏的篇章。这些东西是应该向诗歌爱好者大力推荐的。对于新生的文化现象，主要是引导，而不是扼杀。”

由此，又说到曾引起轰动的吉林大学“北极星诗社”——这个大学生自发的诗歌组织与公木先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他回忆道：“当时，作为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等人，已然被长春市的公安机关注意，气氛很紧张。据说，监狱已经准备好了，时机一旦成熟，马上批捕。中文系专门为此开批判会，我参加了。我先说了‘这些学生宣扬西方诗歌理论，没有遵循民族化创作道路’等等一大套，总之，都是别人批判过的词儿。复述完这些，我话锋一转，又说：‘上述观点都是别人说过的，现在，我谈谈自己的看法。’中文系的老师们知道我要‘袒护’学生了——当然要袒护！他们是年轻的学生，我们是老师。那样上纲上线地对待年轻人就是没有道理。纵然他们在政治观念上有些偏差，也应该允许有重新认识的机会，哪个人没有犯过错误？我们希望别人对自己一分为二，我们对待别人也应该一



分为二嘛。”

公木先生做过很多看似“不合时宜”的事：比如，极力推荐自己的学生——青年诗人徐敬亚去北京开会，宣读那篇引发过纷争的论文《崛起的诗群》；再比如，作为“中国新诗奖”的评委，他力排众议，郑重地投了舒婷的《双桅杆》一票……这是他治学与为人的态度，即：不拜神，不拜金；不崇古，不崇洋；不媚时，不媚俗；不惟书，不惟上。

宽容的话题还有不少历史见证人提起过。公木先生曾对将要毕业的学生说：“将来，如果你们作了文化方面的官员，对待文化人一定要宽容。他们一般都很有个性，要原谅他们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。”

不但是对待别人，对待同自己声息相关的问题他也是这个态度。有一回我问他：“您是《军歌》的词作者。现在，市面上不少音像制品里都把这首歌拿来改编成了摇滚。对此，您为什么不站出来讨个说法呢？”公木先生不赞成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、满城风雨，他说：“一首歌，大家喜欢，爱怎么唱就怎么唱，创作出来就是让社会流传，让群众传唱的。当然，把严肃的《军歌》改编成摇滚很不合适。不过，光凭急着打官司告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还是让时间来检验吧。”

在他的诗作《人类万岁》中，时间被巧妙地比喻成“一把有刺的扫帚”，只要时间“一下决心，什么痕迹也不会存留”。公木先生也会存在无能为力的苦恼，但他决不强求，只寄希望于将来。将来，放逐着命运的不可知，也包含着他的理想。笃信将来的人，永远不会放弃，也永远不甘为悲观主义者。

凡是了解公木先生的人，都知道他对个人信仰的忠诚。这种忠诚，不是“极左”式的愚忠，也不是功利性的盲从；他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，而且是基于历史、现实以及个



人的经验和渊博通达的文化知识。他曾满意地归纳道：“我在‘左派’里有朋友，比如贺敬之；在‘右派’里也有朋友，比如王蒙。不管文艺主张怎样，他们都是很有才华、很有思想的人。我很高兴能同这些不同色彩的人开诚布公地交流。”

我唐突地问：“您对共产主义，真地那样虔诚吗？”他的脸上立刻显出不高兴的神情，回答的语气很强硬：“你可以拿共产主义不当回事。但是，我信仰；而且会带到棺材里去！”信仰是他人生的终极目标，其中有人格与尊严，当然不允许怀疑。这是他的“底线”。

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小妮曾撰文回忆道：“有一天，在课堂上公木老师讲到了延安，说到毛泽东的伟大，他突然哭了，泣不成声。这使坐在1979年里的大学生们很感意外。我当时非常认真地辨别了讲桌前这位并不高大的老人，结果，我看见了让我震惊的‘大真诚’。真诚，往往可以被比拟为万能的钥匙，它能打开一切锁。”

所谓“大真诚”是非功利的，绝对本色的，同时也是无私的。

据公木先生的老友、著名学者蒋锡金回忆：“（公木出访匈牙利和罗马尼亚）回国刚下飞机，就被戴上‘右派’的帽子。他来到我家，我也讲述了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和感想。公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‘我想告诫你一句话，就是我们无论怎样，都不要向党提出翻这个案。你没有做过党务工作，因此不会领会党务工作有多么细密、多么复杂。要翻一个案不简单……我们决不能因一点个人的得失或不平，就去增加党的麻烦。’他说得很真诚，使我感动。”一颗赤诚之心，跃然而出。

王小妮也在文章中写道：“公木老师在1958年被定为‘右派’并流放到东北。但多年后直到他离世，他所秉承的，始终是这种透明的真诚。蚌，用几年的时间含住沙子，吐出珍



珠来。以公木老师的心境，顽石也晶莹剔透了。”

诗人丁耶和公木先生是我 1995 年加入吉林省作家协会的介绍人，两位老前辈曾在一起“劳动改造”。在一篇题为《我和丁耶》的文章中，公木先生说：“我在心里说：我们要争口气！几年来，我擦楼梯、打扫厕所，哪里最脏有泥污，就特意把那里擦拭得最干净、最亮堂。咱们这支队伍虽是遭人另眼看待的，但我们应该自觉成为最文明、最整齐、素质最高、贡献最大的劳动大军。”要知道，当时公木先生的脖子上正悬挂着侮辱性的牌子！人们一边唱着公木所创作的歌曲，一边又高喊着“打倒公木”。即使在那样的“绝境”下，他都没有绝望，而是凭着坚强的信仰与豁达的态度活了下来。

公木先生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老党员。但他被划为“右派”了，党籍也就不存在了。1962 年，吉林大学的校长匡亚明破例把戴着“右派”帽子、正在吉林省图书馆接受“改造”的公木先生调到中文系，而且是担任主任。当时，公木先生已经被开除党籍。但是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党外的人——和大家交流，没有丝毫隔阂。

我在吉林大学时的中文系主任是郝长海先生，他曾亲口讲述过公木先生恢复党籍时的动人情景：“1978 年，公木先生向教师党支部提出了重新入党的申请。时隔 40 年，再次对着党旗宣誓，满头白发的公木哭了，他动情地说：‘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……今天，母亲又宽容地让我回了家……’话到此，他呜咽不已。在场的党员也都热泪盈眶。”

显然，公木先生既不把自己打扮成“文革”的受害者和控诉者，也不想为历史做丝毫的粉饰。此后，又有两位大学老师讲到过这件事。我也曾将这件事附带进了自己的一篇文章，不知为什么，公木先生审读完之后，删去了这部分内容。



(二) 四年就教

严格地说，我算不上公木先生的学生。他已经不给本科生授课了，招来的研究生也常常是到他家里去听讲。后来，他的精力逐渐不济，系里连研究生也不让他带了。由于彼此熟悉，我才有机会到先生家多一些。这些机会，使我亲自聆听了他的许多教诲，虽说只有短暂的四年，但却将受益终生。

首先是他学而不厌的精神。

刚入学，公木先生就给我打“预防针”：“大学本科四年，基本接触不了太多的学术问题。公共课，尤其是外语考试那么紧张，如果不抓紧的话，别说读，恐怕许多书目都没有听说过。即使很用功，也只能打一层薄薄的书底子。”



聆听公木先生（右）教诲

每次与他对坐，先生总是询问开设的课程以及任课教师的



情况。他说：“图书馆是个好地方。五四时期的老一代学人都是那里的常客，他们的广博几乎是后人无法超越的。一本书放在哪排书架的什么位置，一篇文章的具体页码，都说得出、背得过。博览群书是作学问的前提基础。即使不作学问，将来从事其它文化工作，也还是离不开读书。中文系适应面很广，但是毕业生的核心任务不外乎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。不懂文化，没有文化，将来怎么工作呢？”

公木先生是位嗜读的老人，他家里的主题就是书。在书的包围下，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摆在临窗的地方，他能一整天坐在那里翻阅、注释、誊写或者创作。80多岁的人，勤奋得像个备考的小学生。有学生问：“您在延安时就是‘鲁艺’的教师，解放后又亲手参与创办东北大学并任教务长，在北京是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，现在已是吉林大学屈指可数的终生教授了，还辛辛苦苦地学啥呀？”先生的回答是：“知识无止境啊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是学习的好时候。”

其次，是他对书的热爱。

书，是公木先生的“宠物”。他曾跟我说起自己的一套心爱的珍藏：“鲁迅先生的手迹，被一个外地朋友借走了。到现在也没有归还。”看他那么惋惜，我就问：“借走了多长时间？”先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已经20多年了。”我惊讶于时隔久远，一套书还深藏在老人的心里。这并不是“抠门儿”，而是所有热爱读书的人所具有的“通病”。

公木先生甚至为自己百年之后的书籍寻找归宿。他曾告诉我：“除了书房里的东西，楼下还有很多呢。我的子女有的学工、有的学医，没人继承我这些古董。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我死后，将把书籍全部捐献给老家辛集市，在那里建一座小型的图书馆，供学习和研究的人们查阅，这样利用率会高一些。”



先生曾正告我：“你的知识结构中不能缺少哲学。哲学是一切理论的基础，没有这个思想武器，就不可能在研究与创作领域走得很远。当然，学习不是为了熟知典籍里的教条，而是树立一种独立的哲学思维。”他劝我从哲学 ABC 着手，还送我一本《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》。读过之后，我至今还珍存着。

1993 年，公木先生出版了《第三自然界概说》。尽管这本书仅有十万字的篇幅及一千册的印数，但它却仍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定的反响。这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，系统地阐述了他所提出的新概念——“第三自然界”：人类通过劳动，从“第一自然界”中创造出“第二自然界”，人类本身便是这个“第二自然界”的主体，并生活于“第二自然界”，而所谓“第三自然界”则是由艺术创作、诗创作推演出来的假说。这个假说的成熟基于老人 30 年的沉思。他实践着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的诺言，并给我以强烈的心灵触动。当他向我赠书时，还说：“出版社不愿意出版这种纯学术性的著作。我知道，出这类书人家是一个钱都不赚的。”他觉得，人家肯出版，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

那么赚钱的书呢？比如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，这是公木先生上世纪 60 年代的讲义，经过系统整理，保留了 34 万字，1994 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。此书面世以来，一直十分畅销，在众多讲解毛泽东诗词的专著中，它是最受欢迎的版本。截至到 2002 年，再版的数量已超过了二十多万册。据先生说，他拿到了一次性稿酬一万元。先生过世后，师母说：“出版社每次再版，都象征性地给几千块钱。”其实，对于钱，公木先生从不计较，在经济方面他从来是个不会算计的人。

先生对名利的态度，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我。

与其他人一样，我很不理解他目前的名位。从延安到东北，又受命进北京。结果，官越做越小，地域越来越偏，最